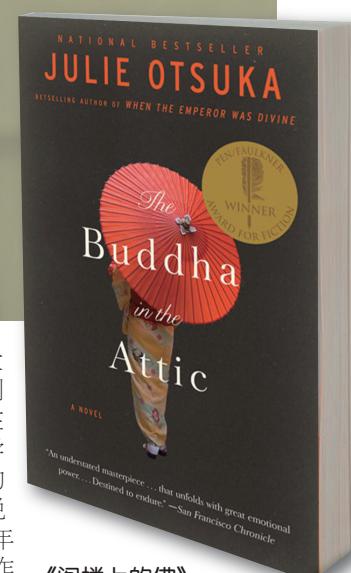


2012年福克纳小说奖获奖作品《阁楼上的佛》:

阁楼上的“她们”

□张莉



今 年3月,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揭晓,日裔美国女作家朱丽·大塚(Julie Otsuka)的作品《阁楼上的佛》(The Buddha in the Attic)最终获奖,捧走了1.5万美元的奖金。

笔会/福克纳奖是美国文学界一项重要奖项。它创设于1981年,基金来自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捐赠的一部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获得过福克纳奖的作家中不乏像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E.L.多克托罗等大名鼎鼎的文坛大佬。与他们相比,朱丽·大塚自然是小字辈的文坛新人。然而,这一结果也并不让人感到惊讶:《阁楼上的佛》在前一年就以极大呼声进入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只不过,最终美国国家图书奖却以奖项空缺的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朱丽·大塚生于加利福尼亚,曾在耶鲁大学学美术,30岁的时候开始小说创作。2002年出版的处女作小说《皇帝曾为天神时》(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以日裔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为背景,叙述了住在伯克利的一家人被拘禁于拘留营的故事。《皇帝曾为天神时》广受好评,为她赢得了亚裔美国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而正当人们对这位文坛新秀充满期待的时候,朱丽·大塚却“沉默”了起来,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直没有重要作品发表。直到2011年,她的第

二部小说《阁楼上的佛》问世,人们才发现,原来她依然钟情于二战这段历史,新作可以说是追溯了《皇帝曾为天神时》的主人公在拘留营故事之前的经历。

然而,这两部作品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姊妹篇。《皇帝曾为天神时》写的是个体经历,是“小”叙事,是独奏;《阁楼上的佛》则回忆了群体的历史,是“大”叙事,是和声;前者不断转换叙述视角,父亲、母亲、女儿轮番成为故事中的主角;后者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它从头到尾的集体式叙述声音,“我们”——那些从日本舶来的“照片新娘”始终吸引着读者关注的目光。故事分8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追溯了“我们”在船上的辛苦与对未来的憧憬、下船之后见到丈夫的失望以及紧张无奈的“初夜”、田间繁重的劳动、对白人雇主的屈从、学习语言以适应环境的努力、生儿育女的艰辛、与子辈越来越多的隔阂以至最后战争引发的种族迁移与隔离、性别、种族、文化、身份、战争、代沟、历史、记忆,少数民族文学中几乎所有常见的主题均浓缩在短短100多页的故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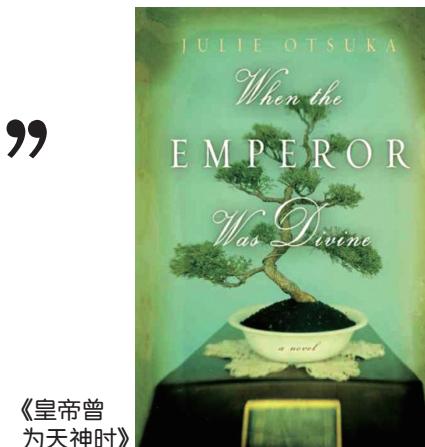
《阁楼上的佛》以一种精致的“宏大”

吸引着读者。严肃的种族历史大框架之下,一个个平凡的生命所划出的轨迹更能勾动柔软的心灵产生共鸣。小说采用含蓄的、有节制的、诗一般的语言陈述了在生活的重重考验、折磨之下的“我们”的希冀、隐忍、痛苦、努力。这种集体式叙述的声音既勾勒出群体共同的感受,又照顾到个体独特的经历,收放自如、视野广阔。这种独特的叙述视角成为小说的一个亮点。在这种全能视角之下,一个女人,不,一群女人的一生立体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怀揣着从未谋面的丈夫的照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自日本各地的姑娘们踏上了遥远的赴美之旅。然而,在目的地迎接她们的并非照片上英俊的男子们和她们被承诺的美好、舒适的生活。打击是沉重的,但她们选择了接受,或者说她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对岸那些人叫着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中有个人用手捂住了眼睛转过身去——我要回家,但其余的人都低下了头,整理我们的衣服,走下跳板,走进了还泛着暖意的日子里。这是美国,我们对自己说,什么都不必担心。但我们错了。”

还没有等她们做好任何心理准备,打击就接踵而来。艰苦的生活条件、陌生



《皇帝曾为天神时》

的文化语境,她们以惯有的顺从承受着来自性别的、种族的、精神的、肉体的多重伤害和折磨。“我们忘掉了佛,忘掉了上帝。我们内心生长出来的冷漠到现在都融化不了。我们不给妈妈写信了……我们不做梦了。我们什么也不要了。我们只干活,就这样。”这种“卓绝”的忍耐力自然是来源于这些女人自幼所接受到的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它也是在作为“先行者”的丈夫们的教导之下、得以强化的结果——“反抗的唯一方式,我们的丈夫告诉我们,就是不反抗。”于是,她们听任丈夫摆布,听从女主人的吩咐、顺从男主人的要求,又独自承受着一切后果和打击。生活让她们变成了“空心人”、“隐形人”。

艰苦的生活造就了麻木的心灵,却也让“我们”迅速地适应了陌生的环境。接下来,生儿育女的经历多多少少改变了生活的基调。添丁进口使生存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麻木的心灵却在婴童们的啼哭声中慢慢软化。母亲,成了这些女人们新的身份——一种确定无疑的、让人安心的身份。她们竭尽所能照顾好这些孩子,呵护这灰暗生活中的一丝希

望和光明。孩子慢慢长大了,在与她们相同却又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上了学、学会了英语、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却反而忘记和疏远了自己的母语和母亲。“通常,他们都以我们为耻。”“我们”养大了孩子之后,又失去了他们。

她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孩子。战争的消息传来。他们远隔重洋的母国日本再次给他们带来灾难,原本艰难却正在慢慢稳定下来的生活再起波澜。仿佛一夜之间,他们成了“叛徒”,成了不受欢迎、应被驱逐的人。不断有人的丈夫被抓走、孩子辍学,不断有人被调查、被恐吓、被威胁,直至终于有一天,他们被要求集体迁移,迁移到无人知晓、前途未卜的远方去。渐渐地、他们淡化在邻居们的记忆里……

而挖掘这段被淡忘了的历史,表达被噤声了的声音,成为作者的追求。朱丽·大塚以小说家的细腻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宏大关怀。作品表面冷峻,底下却激荡起狂乱的回声。小说的标题“阁楼上的佛”,很容易让人们把它同“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女性主义的经典批评之作建立起联系。然而在笔者看来,朱丽·大塚将叙事的声音给了深受各种歧视、遭遇各种挫折,称得上是命运多舛的这一群“她者”,也许不仅仅是旨在替这一弱势群体申冤叫屈,或者唱响女性抗争的颂歌,反而是表现了超越性别的宏大历史主题,“美国梦”的破灭、少数民族的生存和身份危机、面对战争的思考等等。“佛”是许多日裔美国人的信仰,但他在小说中鲜有露面。被遗忘在阁楼上的“佛”是一般俯视的视角,他始终在角落里笑着,旁观着人类在他身边的忙忙碌碌,或睿智,或愚蠢的各种抉择……

在沉重的历史面前,人们也许应该低下高贵的头颅,听一听被我们放置在阁楼上的那些“沉默”的述说。

■ 瞭望台

《江城》:异乡人的视界

□来颖燕

《江城》是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三部曲的另外两本《寻路中国》和《甲骨》都已名声在外,只是不知为何,读起这本《江城》,我有种特别的感动。

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和《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长大的他,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个天生的旅行者,曾自助游遍欧洲30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罗斯、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她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包括《江城》在内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是他写作生涯的成功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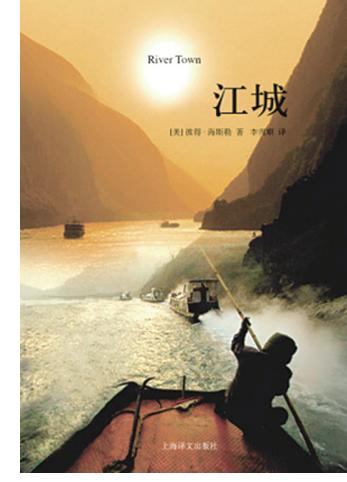
我觉得如果将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也划归为他的“旅游文学”著述之列,似乎并不妥帖。如果仔细读海斯勒的作品,就会觉得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并非只是为了观光——中国的现实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密码深深地吸引着他,才会促使他到中国开始独特的探索之旅,而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层思考力,使他成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江城》记述了海斯勒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涪陵——一个长江边的小城的两年生活。在那里,海斯勒教书,交朋友,学汉语,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最初,海斯勒并没有将这段生活记录成书的打算,但很快,他就觉得在涪陵的生活经历如此充实,以至于让他应接不暇、不知所措,于是他不可遏制地开始做笔记、写日记。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这种发自内心的理念,为《江城》后来成书储备了足够充足且溢满真情实感的材料。而这部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纪实作品,之所以会显得特别,很大程度上则是缘于海斯勒的独特身份所赋予其的独特视角。

距离产生美感,但事实上,因为距离而产生的不仅只有美感。距离的存在,往往会让人们在看待事物时拥有新的视角和眼界。这种情形,当人们在记录自己身处他乡的经历时会显得尤为明显。因为异乡人的身份天然地赋予了其与当地人迥然的文化背景和感知力。这种因为差异而形成的距离,会让一个异乡人在陌生土地上的所见所闻充满惊奇和新鲜感。

海斯勒在中国就是一位典型的“异乡人”。如他自己所言:“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在“亲疏结合”的视界中,海斯勒意图呈现眼中最真实的中国。

该书共分为12章,几乎涉及了海斯勒两年涪陵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却透露出一种坦诚和直白——初到涪陵,学校为当地长征徒步队员的归来和新来的美国教师举办了欢迎仪式,当海斯勒穿着随意的短裤坐在主席台上时,默默地想,以后回到美国拿着照片给朋友们看时,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呢?在学生们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他惊讶于学生所做出的“我不喜欢哈姆雷特,



许正保持了海斯勒对于异乡可贵的新鲜感和感知力。

海斯勒的著述不同于许多西方人笔下的中国,许多西方人只是靠教条的资料呆滞、粗线条地想象中国,就连海斯勒自己也说:“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是以,他才能敏感地洞察到,处在三峡工程之前的涪陵,正是能体现当下中国诸多特质的特定地点——“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20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也正因如此,这个城市才会在他的笔下呈现出丰富的细节,显露出原生态的幽默、生机和活力。

海斯勒在写完全书后,也意识到了观察视角的问题:“外国人一般对中国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但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们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确实,这种复杂和丰富,只有深入到他们生活的肌理中去,跟他们一起晨练、骑车、吃饭、喝酒、摆地摊、参与民主投票,才能体会和感知。但忽视他们的又岂止是外国人或是记者?海斯勒笔下的诸多描述,因其特别的距离感而具有的洞察力所揭示出来的种种问题和事态,常常会让普通国人自己都惊觉,原来问题可以这样看!“只缘身在此山中”,熟悉往往会造就成熟视无睹,往往会使我们失去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反省力,如果我们脱开定势思维,会发现其实从生活琐事到国家大事,有太多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之处了。

所以,海斯勒有“距离感”的视角和身份,也让人跟随他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发现和看待身边许多本已被忽视的问题,而开始关注农民,关注流动人口和原本已经快要消失的小城镇。

想起毕加索当年凭借着与常人不同的现代艺术家的眼光,从非洲木雕中获得灵感从而创作出立体主义的诸多传世名作,而他对于非洲木雕的认识则带领人们重新发现了非洲木雕已被忽视的艺术性。同样,海斯勒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赋予了我们一种“有距离”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尽管他自己说:“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但在这个异乡人的视界中,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属于中国的,却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和特质。如有评论所言:“何伟(海斯勒的中文名)的笔下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 动态

《追忆似水年华》全新修订本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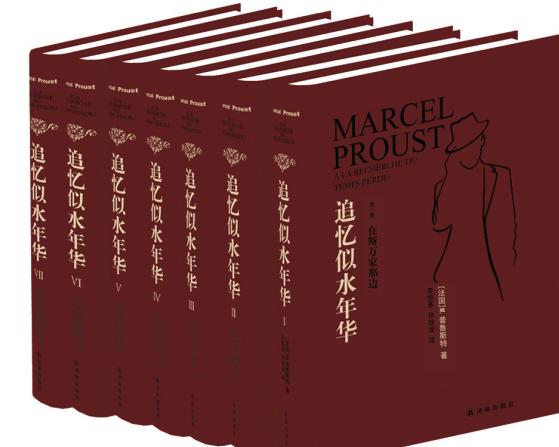
本报讯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这部长篇巨著以其出色的对心灵追索的描写和卓越的意识流技巧而风靡世界,并奠定了它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日前,这部巨著的全新精装修订本已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回忆的形式往事作了回顾,有童年的回忆、家庭生活、初恋与失恋、对历史事件的观察以及对艺术的见解和对时空的认识等等。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它就像一首由多种主题构成的交响乐,爱情、嫉妒、死亡、回忆、时光,而时而交叉重叠在一起,时而又游离开来。《追忆似水年华》被公认为是文学创作的一次新尝试,开意识流小说之先河。

目前《追忆似水年华》已有三个译本。第一个译本是译林出版社于1990年推出的全译本,该译本由15位译者共同翻译完成,其出版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个填补空白的重要事件。这部划时代的意识流小说自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之后,20多年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多次再版,后来中国台湾地区也购买了繁体字版权。该译本是迄今为止两岸三地唯一的全译本。

尽管译者都具有扎实的翻译功底,且翻译态度极为严谨,编辑在组织翻译、审读及编校等工作上亦颇费苦工,但因这部作品长达200万字,文体复杂、结构绵密,由15位译者共担翻译重任,且首版出书时间紧迫,难免留下一些遗憾。鉴于此,译林出版社决心对《追忆似水年华》进行全面修订。

此次推出的修订本参考专家及读者意见,修订的重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按照规范,统一了七卷中前后不一致的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二是增删和调整部分注释;三是参照原文,对译本文字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修订。



在这一全译本的基础之上,当年15位译者中的两位老先生徐和瑾和周克希,都决定以一己之力重译。徐和瑾的译本同样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前三卷。他的风格明晰优美。每卷有插图、内容提要、人名、地名和文艺作品名三个索引和译后记,考证最为详尽。周克希的译本名为《追寻逝去的时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译笔笔墨流畅,现已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王杨)

■ 书讯

切·格瓦拉横跨拉美《摩托日记》

中译本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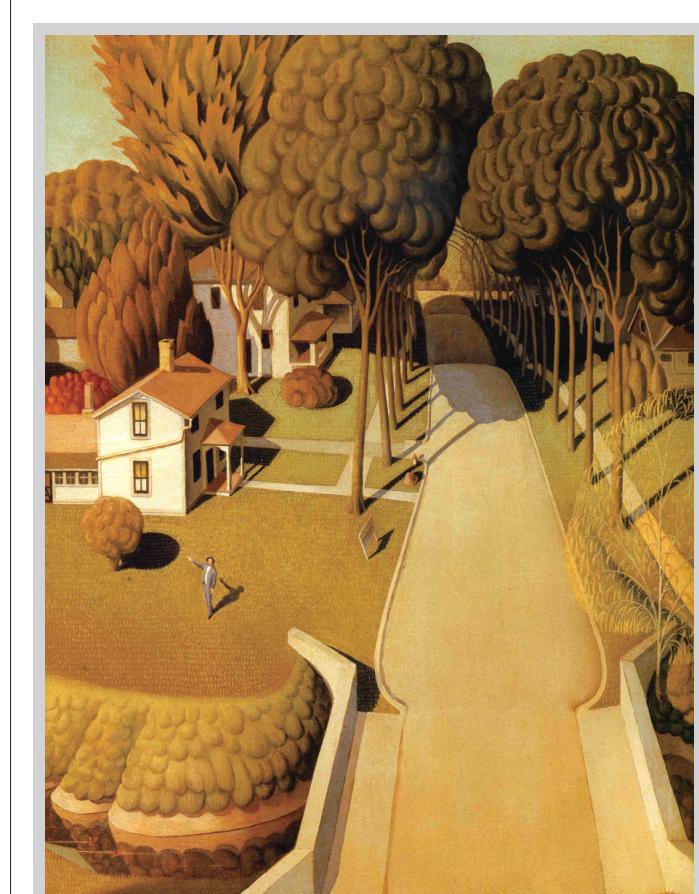
近日,拉丁美洲革命家切·格瓦拉年轻时周游拉丁美洲写下的旅行日记《摩托日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他青年时期漂泊四方而又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日记文笔流畅优美,富于诗意和节奏感,读来生动有趣。格瓦拉对拉丁美洲文化的钻研了解,对拉丁美洲历史和政局的剖析,又为日记平添了几分犀利的思想性和知识的厚重感。

《摩托日记》以真实而感性的笔触揭秘了格瓦拉的人生转折。1951年,格瓦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读书,同年10月,他与朋友阿尔维托·格拉纳多决定驾驶后者的摩托车大力神II前往北美。正是这次旅行,使格瓦拉接触到世界的种种伟大和不幸,影响和改变了他的想法,使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并从他的心里产生了某种拉丁美洲情怀和革命意识的萌芽,可以说这次是改变他一生经历的旅行。

《摩托日记》一书除了46篇日记,24幅珍贵照片及行程图之外,还收录了格瓦拉之女阿莱达·格瓦拉·马尔奇为该书撰写的序言。阿莱达称:“越是反复阅读这些日记,我就越爱我的父亲。”通过阅读,“慢慢地我们就会明白他的梦想与志向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他日益意识到了民众的疾苦,也凭疾苦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阅读这些从激情、疯狂到善感、同情直至蜕变的日记,或许能让今天的读者明白,“正确诠释的现实世界会深入人心,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世文)



美国画家Grant Wood的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